



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

文丛

Liliangyu Jiaoshou Yu Qi Boshisheng Wencong

李良玉史学文稿

Liliangyu Shixue Wengao

李良玉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文丛

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

Liliangyu Jiaoshou Yu Qi Boshisheng Wencong

李良玉史学文稿

Liliangyu Shixue Wengao

李良玉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良玉史学文稿/李良玉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8

ISBN 978-7-5650-0558-9

I. ①李…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文集②中国历史:现代史—文集
IV. ①K250.7-53②K26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8989 号

李良玉史学文稿

李良玉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编 230009
电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hfutpress@163.com

版次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34.5
字数 676 千字
印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0558-9

定价:58.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总 序

“李良玉教授及其博士生学术文丛”原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2007年9月起，将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继续出版。为了既体现丛书的连续性，又显示新一家出版社的气象，丛书名改为“李良玉教授与其博士生文丛”。

2005年8月至2006年8月，在知识产权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在副总编辑王润贵先生和编辑牛洁颖女士的直接主持下，共有《李良玉历史研究与教育文选》和我的5位学生的博士论文出版。我衷心感谢所有关心和参与这套丛书的朋友们的远见卓识和辛勤劳动，也特别珍惜和他们相处过程中所获得的真诚。记得我在给牛洁颖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过：“人文社会科学的东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已。我很欢迎和你推心置腹地讨论问题，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把书出好；立场是一致的，就是以诚相见；我想效果自然也是可以预见的，就是互相更加信任，友谊愈笃。”这段文字代表了我们的共识。

1999年，南京大学通过有关程序确认我具备博士生导师资格，次年我开始招收学生。假如按今天官本位条件下博导的实际社会地位、声誉及其所承担的职责等多项指标来衡量，成为博士生导师或许并非幸事。然而，我仍然感谢学校领导、研究生院和所有参加评审工作的校内校外专家，他们给了我一份可能，如同我在第一届学生答辩的时候所说：“使我有机会获得培养青年、提携才俊的创造性工作的快乐”。它来源于教育的诚实、神奇和自我满足。

把我指导的学生的论文结集出版博士论文丛书，是我招收博士生伊始就定下来的努力方向，也是一开始就向同学们提出来的目标。这是一个艰难的目标。现在，这套丛书已经拥有29种著作，预计今后几年内将达到50种左右的规模。假如有人问我，丛书的价值何在？我依然回答：任何著作一经出版，对它的评判权从来就不属于作者。只有读者和时间的检验，才能最终决定其命运。

除了我的书以外，这套丛书的著作，多是我的学生的博士论文。读他们的书，能读到一些锐气，自然也会有一些幼稚。同学们努力学习的风范是值得夸奖的，从这个角度上说，丛书为了解当前博士生教育提供了一例个案，不论这一个

案有没有价值。

回顾招收博士生以来的教书生活，我从内心深处感激我的学生。无论来自何方、年龄大小、从事过什么工作，他们为了读书求知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坦诚相处，教学相长，虽然也会有艰难或者隔阂，但毕竟能够获得一些理解与成长的经验。我始终认为，生活的本质在于真实。基于这样的理念，我曾对同学说过，追求真实而不追求虚伪，追求幸福而不追求痛苦，追求理解而不追求怨恨。博士生的学习生活是一种知识、道德和能力的全面提高过程，它既是学生的提高过程，也是老师的提高过程。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由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所积累起来的进步。

在同学们的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新时代学术的朝气。尽管他们各自人生阅历、知识背景、生活目标不尽相同，但是读书生活却给了他们以同样的学术传统、学术理念、学术规范与方法的熏陶。在这里，我个人的能量是有限的。不过，我们拥有传统人文的深厚资源、外来学术的精彩信息和百年老校的丰富积淀。它们浩如大海，蔚为壮观。也许，现代与传统的衔接，师道与学统的交汇，个人与时代的融合，才是他们不断自我觉悟，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

博士论文，是博士生学习的主要成果，也是当代学术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引导同学完成博士论文的过程，是师生之间知识交流、思想交流、情感交流的完整过程。对老师来说，同学的敏锐、勤奋与活力，是那么的宝贵；对于同学来说，每一类学术题材的发现，每一种学术思路的开拓，每一个细节问题的解决，都会带来学问启蒙和心灵震撼的作用，甚至包括对人生意义的新认识。20多年来，有相当多的博士论文开辟了各自学术领域的新境界。它告诉我们，博士论文质量的根本标志，是按照学术规范研究解决问题所达到的水平，或者说，是解决问题的难度及其所包含的开拓性成就。有鉴于此，我们才应该把博士论文看作是一种文化创造，一种当下社会和时代应当能够留下来的精神产品。要求所有博士论文都达到这样的水平也许很难，但是，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必要的，鼓励每一位博士生向这样的目标努力前进也是有意义的。

是为序。

李良玉

2011年8月30日于南京大学港龙园



目 录

【研究论文】	(1)
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利用档案问题	(1)
“高饶事件”笺注	(27)
我对新闻史研究的理解	(62)
民族融合的新起点	
——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	(68)
提高研究水平的基本途径	
——关于史学论文的写作	(74)
怎样修改博士论文初稿	
——以历史学为例	(80)
城市化与过度城市化	(89)
在总结经验中建设党	(99)
【博士生课外讲习录】	(113)
陶海洋博士论文开题报告和贺俊杰论文提纲讲评	(113)
陈国庆、柳森博士论文初稿讲评	(118)
坚持诚实互信的原则	(132)
龙观华、施亚利开题报告讲评	(138)
陶海洋博士论文初稿及皮学军开题报告讲评	(142)

李建中博士论文讲评····· (149)

研究社会底层历史资料的意义····· (156)

学习的重要任务是掌握读书方法····· (159)

【博士论文与著作介绍】····· (164)

历史是人民群众用血汗书写的生活业绩

——对吴渊的博士论文的介绍词····· (164)

永远保持思想的活力

——对翟洪峰的博士论文的介绍词····· (167)

把科学精神贯彻于当代的研究

——对柳森的博士论文的介绍词····· (171)

站在文明演进的高度研究近代出版文化

——对冯春龙的博士论文的介绍词····· (175)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广东土地改革研究》序····· (178)

《柳叶集》序····· (183)

【读史笔记】····· (187)

“总理”、“总理纪念周”和“国父”····· (187)

《外交部关于收回威海卫租借地案报告》形成时间考····· (190)

王朝末世的辛辣讽刺

——解读老漫画····· (193)

冯玉祥敦促武汉分共“马电”有关郑州会议内容考释····· (198)

关于“曾国藩热”的随想····· (206)

【讲 座】····· (214)

关于南京和中国革命····· (214)

关于抗日战争····· (217)



地方通史的编撰方法·····	(222)
【文化散论】 ·····	(228)
“大学精神”解 ·····	(228)
培养说真话的习惯·····	(230)
高考招生制度的改革方向·····	(232)
正确认识中医的科学价值·····	(234)
为建立新型社会价值系统而努力·····	(236)
写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日·····	(238)
审慎地进行户籍制度的改革·····	(240)
讲好历史课是一门艺术·····	(242)
办好专栏与文责自负·····	(244)
【回忆录】 ·····	(246)
一张老照片与四个知青的命运·····	(246)
回忆 1976 年南京“三·二九”运动 ·····	(252)
【报告与总结】 ·····	(261)
关于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编写问题·····	(261)
关于高中历史教科书的修改定稿问题·····	(273)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送审报告·····	(289)
【综述与建议】 ·····	(296)
“十五”期间的江苏史学研究 ·····	(296)
【学术评语】 ·····	(309)
【博士生文稿批语】 ·····	(381)

【附 录】 (516)

心头雨

—— 我的答谢词 (516)

中医科学价值座谈会记录 (521)

博士后札记 周其厚 (526)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 读《柳叶集——李良玉博士生教育文录》 李星星 (537)

从思想史的视角研究历史

—— 读《李良玉史学文存》 赵筱侠 (540)

【后 记】 (545)



关于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利用档案问题

—

中国当代史是历史学园地中距离现实时代最近、社会关注度最高、政治敏感性最强、历史借鉴意义最直接的学术领域。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除了必须十分注意叙事立场的客观公正，分析评论的准确适当之外，还必须十分注意学术方法的科学严谨。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大力挖掘和利用档案。

在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利用档案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是研究作品的科学性的最重要的保证之一。为什么这样说呢？

第一，中国当代史具有国家知识的性质，拥有政治性和学术性并存的特点。正因为如此，它的学术公信力就特别重要。中国当代史的研究作品，不仅仅体现了作者或某一作者群的学术公信力，某些特定作品，一定意义上也是社会政治公信力的衡量指标之一。因此，中国当代史研究，必须坚持学术性第一的基本原则，一切从材料出发，而不是从政治预设出发；一切从史实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想象出发；一切从历史规律出发，而不是从理论概念出发。

第二，当代中国历史与执政党的历史是不能分割的，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执政党的政治实践，实际上就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轨道。其中，执政党在各个历史阶段所采取的方针政策，具有决定的意义。要准确地说明当代历史，必须准确地叙述和解释这些方针政策，这必须依靠正确地利用档案才能做到。

第三，由于中国当代一系列社会管理政策的特殊性，当代中国的其他历史资料都有一些无法避免的局限性，不能充分利用，这就更加凸显了档案资料的珍贵性、重要性、不可缺少性。

比如，报刊资料。除了建国初期的一些政治运动，报刊上有比较充分的报道之外，后来很长时间里，许多社会政治活动，甚至重大事件，报刊上并不报道。

比如，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经济调整举措、“文革”时期的各地派性斗争等等。

比如，回忆录资料。由于当代历史的特殊性，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包含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是许多事情在还不明朗化的情况下，一些当事人所做的说明或者回忆，就不是十分准确。其次，许多事件的当事人，限于与涉事各方的利益关系，经常有些回忆材料包含的主观感情因素太强，大大影响了它的可信性。再次，限于各种条件，至今所发表和公开出版的当代回忆录十分有限。这些原因，造成了当代史研究中利用回忆录资料的局限性。这里，我只想举一个高饶事件的例子。邓小平曾经回忆说：

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①

薄一波也说：

对受高饶影响而犯有错误的同志，中央在处理时也是非常慎重的。^②

这些说法一般来说是对的，但是，根据原东北局副书记张秀山的回忆，东北方面的处理，还是比较重的。他说：

东北各省市的主要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撤换，有的降级，有的降级下放，有的长期不分配工作。像鞍山市委的8个常委全部撤换，市委书记华明是大学生，在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当过工程师，年轻、有能力，只因他曾经给高岗当过秘书，被逼自杀（未遂，“文革”中被迫害死）。黑龙江省省长李长青被撤职下放，死在乡间。原辽西省委代书记兼省长杨易辰，降职到黑龙江省当副省长，80年代调中央，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时，在其档案中还夹有与高岗有牵连的材料。大连市委副书记陈伯村也受到降职处分等等。^③

陈伯达也谈到在处理高饶事件的过程中，饶漱石问题的扩大是不正确的。他说：

高饶事件也错误地牵连了一些干部。潘汉年同志的案子就是揭发饶漱石时，把事情扩大化搞出来的。^④

杨尚昆在谈到由反对高饶集团牵扯出来潘汉年、杨帆冤案的时候也说：

①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93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页。

③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24页。

④ 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阳光环球香港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第121页。



后来对饶的处理出了格，主要是毛主席当时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助长了“左”的情绪，又过分自信，听不进不同意见，违背了他本人一向倡导的“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前头”的原则，以致犯了主观臆断和先定性后查证的错误所致。^①

我这里不是说邓小平、薄一波他们的回忆不真实，而是因为他们处在中央高层，发表这些看法的时候比较早，原先有关情况还没有充分披露出来，他们并不十分了解。这是当代回忆录有局限的一个例子。

第四，当代时期的档案资料具有空前的丰富性，开发利用这些资料，有利于繁荣中国当代史学术事业，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当代史本来应该成为一门严肃的学问，但是，常常因为某些著作史料不扎实，论述不靠谱而不受尊重。这与研究人员的观念方法有关系。当然，也和人们在档案管理方面的不正确认识有关。过去，人们常常不恰当地强调当代档案的保密性，不愿意充分地开放档案，不愿意鼓励专家查阅和利用档案，甚至采取种种方法，限制档案的利用。这是不正确的。

过去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学问，就历史学来说，是指每个时代都可能发现这个时代最有价值的材料，做出最能体现这个时代的特点的研究成果，产生最能代表这个时代学术价值的学问家。假如能够充分利用档案，运用严格的学术方法鉴定、理解档案，关于中国当代史的研究成果，完全能够做到超越当前的种种局限，形成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科学作品来。

在当代档案里，最有价值的是党和政府的决策档案、政情档案、经济与社会数据档案。这里要指出，笔者所说决策档案、政情档案、经济与社会数据档案，并不是现在通行的档案分类术语，而是笔者根据档案资料的记载内容相对于历史研究的价值，所总结归纳出来的史料学概念。各级档案馆实际收藏的档案，是按照各党政机构统一编序，以全宗号归口保管这些机构交付的档案的。笔者根据各类档案的历史内容，把具有执政当局决策作用、反映社会实况作用和经济与社会统计数据作用的档案资料，分别归纳出来，作为史料学的特定概念，对于研究人员查阅档案的时候，心中有数，提高利用效果，应该是有益的。

^① 杨尚昆：《回忆高饶事件》，《党的文献》2001年第2期。

二

所谓决策档案，是指与执政当局制定各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制度、法律、规章、计划、决定、政策、指示有关的档案资料。一般说来，包括以下几类材料：各级执政当局颁布或发出的各类制度、法律、规章、计划、政策、指示；各级领导人就重大问题和重要工作部署所作的工作报告、讲话、批示、书面或口头指示；围绕各项制度、法律、规章、计划、政策的制定，有关当局、机构、政要或个人所形成的调查研究、讨论记录、草案文本、修改意见，等等。

决策档案在说明当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拥有无可取代的价值。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执政当局的政治意识、价值追求、发展模式、施政手段与策略，总是需要认真研究的。就中国当代发展来说，各级党政领导机关的方针、计划、决定，往往直接决定了事态实际演变的趋势和结果，是相关社会运动、重要事件甚至日常政务进行的关键。现在，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查和叙述这些过程的时候，这些关键就是我们必须紧紧扣住的要点。

举一个山东省委实事求是地解决全省困难生产队问题的例子。

1962年7月，中共山东省委曾经向全省公社以上各级党委通报了省委调查组的一份调查报告，同时宣布了省委《关于加强困难队农业生产恢复工作的指示》，调查报告和省委指示同时上报华东局和中共中央。^①

调查报告是山东省委调查组1962年5月5日写出的，题目是“一个生产破坏最严重的大队”，全文分为“严重程度”、“主要原因”、“如何渡荒”、“翻身办法”四个部分。根据这份调查报告，省委提出了帮助全省困难生产队恢复生产的五条办法。

调查报告所反映的韩庄大队，当时是山东省齐河县的一个生产大队，也是三年大饥荒时期齐河县、山东省、甚至全国所罕见的饥荒典型。农业部副部长惠中权在这个大队做了专题调查；省委调查组做了逐户访问，开了七次座谈会，把大跃进所造成的破坏和农民所处的绝境，做了如实的报告，提出了调查组通过干部社员的讨论所决定的渡过灾荒的办法。调查报告和山东省委的指示，构成了当代一份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珍贵内容。

调查报告指出，1958年以来韩庄大队所遭受的破坏，“不是一般的伤了元

^① 山东省日照市档案馆藏件，全宗号1，目录号2，案卷号312。

气，而是严重的伤筋动骨”。和1957年相比，出现了五个方面的严重问题：

“第一，人口减少了百分之四十一·二。全村原有五十八户，二百四十人，现在四十九户，一百四十一人，减少九十九人。其中，死亡四十九人，外流未回的三十二人，改嫁出村的十一户、十八人。本来，全村实际减少了十五户，有十户死绝了，五户外流把户口带走。”“一九五八年全村生四个小孩，死亡一个；从五九年到现在，基本上没有生孩子（只有杨森荣的老婆外流到东北以后怀孕，今年生一个孩子），现在没有一个孕妇。”“其次，单身汉多，群众说：‘三席、一提篮’（二十五人），除去已死去的以外，在现有四十九户中，有二十二条光棍子（包括结过婚的十三人，老婆改嫁的九人）。 ”

“第二，耕地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七。一九五七年全村八百零五亩地，现在五百零八亩，减少二百九十七亩，平均每人减少了二亩地。”“在一九五六年，全村粮食总产量是十五点一万斤（自留地在外），平均亩产一百九十四斤；一九六零年，全年只收一千八百一十斤，平均亩产三点五斤；一九六一年总产三千三百七十斤，平均亩产六点六斤。”

“第三，耕畜基本上死光。一九五七年，全村耕畜三十九头，一九五八年减少为二十九头，现在只有四头。”“四年来，全大队实际上死牲口三十九头，现在保存的四头耕畜，只有一头驴稍好一点，两头牛经常卧倒，寿命不长了。”

“第四，农具减少到不能应付最低生产的需要。耩由二十架减为六架，耙由五盘减为二盘，旧式犁全部破坏”，“运输工具还只有一辆木轮大车（原有九辆）”，“各种小农具大部破坏变卖”，“场间用具（杈、扫帚、木锨等）只落七件”。

“第五，社员生活十分困难。全村原有房子二百四十间，现只剩下八十间，其中大部破、漏，较完整的只有三十间。”“全村财产全部卖光或基本卖光的有二十七户”，“四年来，全村不死人、不外流（临时外流的不在内）的只有八户”，“原有姓刘的八户，有七户饿死十一人，自杀一人，刘汝祥兄弟三人，七口人，二年死亡五口。刘再林（三十三岁）死后，老婆上吊自杀，剩下两个孩子，一个由本家哥哥寄养，一个送给外村作童养媳。刘耕田，原五口人，他饿死后，老婆哭着抛下两个孩子（一个一岁，一个七岁），带着一个孩子改嫁，因在外受气和思念孩子现在又被迫回来。”

调查报告分析了造成绝境的原因有三条：“粮食征购过头，劳力外调过多”；“耕地大量外调”；“干部多次换班，领导没有核心”。调查报告指出：“一九五七年粮食总产十万零四千斤，征购四万五千斤，社员平均口粮只有二百一十三斤。”“五九年总产只有二万斤，还征购七千零九十六斤，集体分配的口粮全年每人平均只有四十九斤。”“五九年冬季外调男整劳力四十六人搞水利，连续四十多天，

家中食堂断炊，劳力无口粮可带（要自带口粮），当时冰天雪地，还要日夜突击，因此，前方、后方出现大量病人，有的死在工地上，有的死在路上。到六零年春，全村大部分人饿倒了，青壮年能挑动水的只剩下一人，三、四月间大量死亡。全村四年来死亡的四十九人中，有三十四人是在这一段饿死的”；“一九五八年秋后，进行土地连片大调整，全大队调出四百一十一亩，调入一百一十四亩，净调出二百九十七亩，调出的地大部土质比较好，调入的多是沙碱地，当时二百四十个人，每人少了一亩二分好地”；“自五八年以来，正副大队长换过十五人，最多的当一年，少的当二、三个月。”

调查报告汇报了该村群众几年来渡过灾荒的办法，主要是国家救济、自谋生路、坚持生产：从1959年起，该村年年吃统销粮；1960年起，国家把口粮、种子粮全部包下来；1961年国家另外还救济了“牛三头，地排车一辆，手推胶轮车一辆，化肥一千斤，水车三部，另救济布五百三十尺，救济款四千三百一十三元，贷款一千二百五十三元，还帮助机耕二百多亩地。”自谋生路的办法主要有三条：破产渡荒，外流逃命，买卖贩运。

调查报告提出了三条翻身办法：一是“定住心，站住脚”；二是国家扶持；三是根本大计。

所谓“定住心，站住脚”，包括“种上地，保住苗，不撂荒”；“安排生活，渡过春荒”，由县里调拨五千多斤粮食作社员口粮；组织修缮房屋，保住现有的八十多间房。调查报告要求上级在四个问题上给予扶持：支援急需的小农具“锄二十五张，锹十张，地排车二辆，手推车四辆，水车筒子两付”；由公社拨煤三千斤，用于换二千斤牲口的饲料；由公社安排春播和夏播的种子；由县里安排拖拉机帮助秋季耕地二百五十亩，冬季耕地二百五十亩。

调查报告提出了六条翻身大计：“恢复耕地，克服碱化”，由县社两级负责调回外调出去的二百九十七亩地，组织农田改造；“养猪积肥，恢复地力”，鼓励群众养猪，每户分配半亩地，养猪就顶饲料地，不养猪就顶口粮。一头猪一年向集体交两方粪，按质论价，年终分配，保证兑现；“增加耕畜”，提倡公养私养并举，凡私养，“每头拨给一亩饲料地”；“增添农具”，配齐小农具，逐步添置大农具；“大量植树”，过去村子里有大批树，1956年曾收鲜枣一万余斤，梨七千多斤。现在只有各种树不到一千棵。计划今年栽杨树1000棵，明年栽2000到2500棵，后年3000棵，1965年全村达到10000棵。除集体的果林以外，发动群众栽树，“谁栽谁有，将各户原有的场园、树行地、村内、村边、闲散地一并确权，划归社员种树”；扩大水浇地，建设保收田。

调查报告提出：“今年征购全部豁免”，同时向群众公开宣布：“三年内免征免购，今年夏季供应一部分，秋后做到自给”；加强组织建设，“健全领导，树



立信心”。

山东省委的指示说，韩庄大队是德州地区灾区中困难最大的一个大队，在全省来说是少数，“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存在不同程度困难的生产队，各地都有一部分，在北部德州、聊城、惠民三个灾区，大约有百分之二十几到三十左右；在东部、南部各个地区，大约有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左右”。各级党委要下定决心，解决这些困难队的问题，“要逐个进行摸底排队，做出计划”，改变局面。

山东省委的指示提出了五条政策：

一、要由领导干部亲自动手，组织力量，深入困难队，发动群众，解决问题，“对过去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要严肃诚恳地向他们检讨，让他们把内心的话和痛苦讲出来”。

二、“要根据实际情况，在最近两、三年内适当减轻或豁免困难队的农业税和统购任务，给农民以休养生息的必要条件，”使他们首先争取自给，然后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恢复负担和统购任务。

三、要给予经济扶持，解决困难队的口粮问题。“对困难队当前口粮、农业贷款和生产资料供应，不要受那些烦琐规定的限制，口粮要保证维持当前生产能力，贷款时间可以放长一些，生产资料当年不能收回可以过一些时候再收，有些还要给予救济”。

四、从困难队实际出发，“既坚持集体化道路，充分调动集体积极性，又照顾当前群众的切身困难和觉悟程度，适当利用个体积极性”。“对社员开垦种植的小片荒地，少量‘保本田’和‘借种田’等，如果经过正面讲清道理后，群众要求继续耕种，就不要硬性收回；要求分的应允许分一点给他们，已经包产到户、或者实际分散单干的少数农户”，只能用说服和示范的办法，而不能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去批判和纠正；“灾区的集市贸易，应该放宽一些”，使农民可以通过市场调剂粮食和副食品。

五、培养和选拔好干部，“充实与加强困难单位的领导”。

上述山东省委调查组的报告和省委指示，就是一种决策档案，对于当代史研究来说，它拥有巨大的历史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

它非常客观地反映了三年大饥荒时期山东一个最困难的生产大队所陷入的绝境，省委工作组针对这个村的实际情况，所提出的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以及省委所提出的解决全省困难队的统筹政策。这些政策措施，合情合理，扎实可行，没有一句空话。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这份材料具有不容置疑的真实性。这是它的历史价值。

它产生于1962年5月，它是在1962年1月中共中央“七千人大会”、2月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即“西楼会议”之后产生的，是“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的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直接产物。完全可以肯定，没有这两次重要的会议，没有这两次会议上以刘少奇、陈云的报告为代表的实事求是的辉煌精神，山东省委就不可能提出这份调查报告和指示。这是它的思想价值。

作为一份当代官方文书，它不仅体现了一个省的领导机关中的求实精神和民生意识，而且体现了当代政界中为民众利益执言担责的优良政道。其实，当代时期也和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一样，无论政界风气如何，总有奋不顾身、为民众利益大声疾呼之人。我们可以说，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官文化；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优良官文化的继承。这是它的文化价值。

所谓政情档案，是指反映各级党政机关和职能部门施政状况与社会实际动态的档案资料。一般说来，包括以下几类材料：各级领导机关和职能部门的经常性工作报告、总结报告、汇报材料、请示报告；各级领导机关或职能部门的内部通讯、内部参考、内部动态、内部通报；有关重大问题的专门调查报告和处理意见；反映社会各界或群众意见的各类报告、信件、申诉材料与调查处理意见；各级领导机关、职能部门和领导人了解和处理社会热点问题、突发事件、社会动态的回报、请示、指示、总结，等等。

在当代史研究中，对政情档案要给予特别的重视。政情档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些材料是各级领导者、职能部门、调查机构专门收集起来的，直接来自有关问题、事件、群众现场，直观反映了社会实际状况的素材。其中许多材料，在事实发生阶段，是该级领导机关内部掌握，或者作为政务动态上报给上级甚至中央掌握的情报信息。它们的根本性质，是作为来自社会第一线的确切资讯，为领导机关采取措施，提出对策，制定法律政策提供依据。一般说来，这些材料往往与公开发表的施政文件、新闻报道等材料有严格的区别，比它们更全面、更准确、更可靠。在当代史研究中，这类材料运用越多，可信度越高。

举一个关于1959年农村公共食堂发展情况的例子。

农村公共食堂的兴办，是大跃进运动中的一个重大问题。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曾经下发过一份《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指示》，这份文件附发了三份内部通报：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概况》、《河南省委书记处办公室3月5日电话汇报》、国家统计局1959年1月统计《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发展情况》。这三份材料，就是一种政情档案，它提供了以下几点情况：

一是截至1959年底全国27个省区农村公共食堂的情况：共有农村公共食堂三百九十一万九千个，就食人员约四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口数72.6%。分省统计如下：

